

坐下来的中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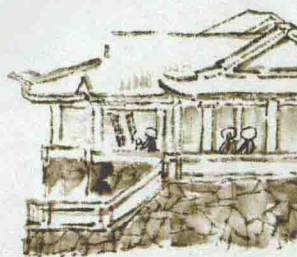
高明勇 等著



Zuoxialai de
Zhongguo

奔跑着的中国，值得奋斗
坐下来的中国，更须努力

三十多年，中国快马加鞭，也问题多多。
问题是什么，从何而来，如何解决。
国家、个人，都需要适时『坐下来』，
反思『奔跑着的中国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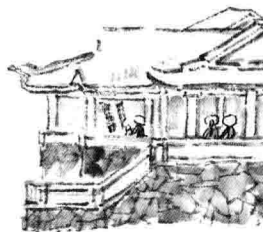


坐下來 的中國

高明勇 等著



Zuoxialai de
Zhongguo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坐下来的中国 / 高明勇等著. —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4. 3

ISBN 978-7-213-05999-5

I. ①坐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社会问题—中国—文集
IV. ①D669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4060号

坐下来的中国

作者: 高明勇 等著

出版发行: 浙江人民出版社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)

市场部电话: (0571) 85061682 85176516

集团网址: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<http://www.zjcb.com>

责任编辑: 魏宏岩 潘玉凤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

责任校对: 张志疆 姚建国

电脑制版: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

印刷: 杭州豪波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张: 19.5

字数: 31万

插页: 2

版次: 2014年3月第1版

印次: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213-05999-5

定价: 3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坐下来，想一想

高明勇

如你所见，这是一次“时事访谈”的集合。

顾名思义，“时事访谈”就是围绕当下时事所做的访谈。

可以访谈的事情很多，比如“中国病”，社会发展的的问题与症结；比如“中国人”，作为个体的幸福与苦痛；比如“中国梦”，个体的诉求与追求，群体的努力与方向。

对于这种“时事访谈”，我称为“坐下来的中国”，寓意有二：

其一，与“奔跑着的中国”相比，我们需要从“拼命挣钱”到“学会有闲”的转变。“别走得太快，等一等灵魂”，这是印第安人的一句谚语。实现“中国梦”，不仅要有力气“快”起来，还要有勇气“慢”下来，更要有底气“坐”下来。

其二，与“站立着的中国”相比，我们需要从“伸头争吵”到“静心探讨”的转变。解决中国问题，光站着骂街发牢骚无济于事，基于行动的坐下来谈论才是真意义。构建好的公共生活，需要多关注“中国病”，需要多一些圆桌对话。

简单说，“时事访谈”提供了一个坐下来，想一想的机会。

作为方法的“坐下来”

四年前，2010年4月初，我联系采访王绍光教授。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、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，在舆论视野中，他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学者。

但是，很少有人知道他对煤矿安全生产监管也有研究。当时，山西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，事故造成153人被困。经全力抢险，115人获救，另有

38名矿工遇难。

访谈的由头，就是为何“矿难”已经造成新闻疲软，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，国外都是如何治理煤矿的。

几天后，访谈在《新京报·评论周刊》发表了，标题是“美国矿难是如何降下来的”，引来许多的关注。

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仅仅是这个访谈，而是在访谈中王绍光教授的一句闲话：“当下中国，伸着脖子说话的人太多了，坐下来静心思考的人太少了。”

矿难这类的话题，需要有调查、有研究、有专业的学者去谈，才更能谈出真知灼见来。

所以，我认为“坐下来”是一种方法。

我曾在专栏“高看一眼”（《青年记者》2013年）中刊发过一篇文章《时事访谈：坐下来谈论“中国病”》。

文中我提到，相对于其他的专家对话或新闻采访，“时事访谈”有什么特殊之处？我认为有三点“与众不同”：

一般的新闻采访，大多突出“新闻意识”，而时事访谈，则更突出“问题意识”；一般的新闻采访，大多突出“时效立场”，而时事访谈，则更突出“时代立场”；一般的新闻采访，大多突出“亮点精神”，而时事访谈，则更突出“追问精神”。

就程序来说，每一篇时事访谈，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步骤：

选题拟定。题好一半文，一个好的题目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了一篇时事访谈的命运。这些访谈题目，都是一时的社会热点问题（不少选题的热度一直存在，因为问题并未解决），当然都是过五关斩六将，经过多次讨论把关，最终进入操作程序。

资料收集。几乎每次做访谈，最抓狂的就是搜集资料。这个社会问题的相关报道，最新的研究成果，如果已有合适的访谈人选，那么这位学者的专著、论文，近两年来的主要观点，学界的大致评价，都要一一找来阅读，像做一篇研究论文的架势——我想说的重点是，所有这些都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。

采访提纲。一般采访我不喜欢也不习惯用采访提纲，关键看记者的“牵牛能力”（我一直认为记者采访要有点牵牛吃草的水平，哪怕是面对再牛的学者）。但是，如果想真正谈出点东西来，采访提纲就很有必要，比如提供必要

的情节、细节、数据或主要观点。

寻找专家。找专家其实并不难，按照六度分割理论，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五个，也就是说，最多通过五个中间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，何况是闪闪发光的学者。但是——最重要的是“但是”以后的话，如何寻找最合适的专家？不是单纯的名气或身份等即可，而是要看其是否有过调查，是否有过研究，是否可以做到洞若观火，一针见血。

作为观念的“坐下来”

“坐下来”不仅仅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也是一种提供公共服务的观念。

有一个韩国朋友在北京读书，有一次我们聊天时提及对中国的印象，他说了两个细节：一是公园和街道两边等公共场所缺少椅子，走累的话想找个地方歇歇脚都很困难，并且城市的生活节奏很快，好像很多人都是在小跑；二是很少看到笑脸，不管是在大街上，还是在地铁上，几乎一律都是没有表情的面孔。

相信“缺少椅子”的细节很多人都深有体会。记得几年前，有新闻报道说南昌火车站广场供人休息的绿化带“石凳”，全部被铁栏杆围了起来，让人望凳兴叹。有关部门回应：网友和旅客所指的“石凳”其实是树坛，一些旅客把树坛当成凳子来休息，给“管理工作带来了许多麻烦”，“除了破坏绿化带之外，还有些旅客躺在上面睡觉，严重影响南昌火车站作为省会城市窗口的形象”。

原来是“误会”，大家都以为是南昌火车站提供了“椅子”，其实没有，不但没有，连替代性的椅子不也能用。

这让我想起大学时代，每次开学坐火车去学校，在郑州火车站等车，都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情，场面蔚为壮观，大部分人都在广场上三三两两席地而坐，或摊开几张报纸席地而卧，偌大一个广场就像难民营。

我的朋友、专栏作者邹振东曾在《南方周末》撰文《中国，请坐》，评论说中国真正缺乏的是“请坐”的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，否则，很难解释明明有“无心插柳”的石凳，偏偏还要把它封锁起来；很难解释医院买得起昂贵的仪器，却解决不了家属可坐可躺的陪护床椅；很难解释政府可以建得起偌大的公园和广场，却置不起小小的凳子——打开网络搜索，有多少城市的市

民在呼吁政府给自己身边的公园和广场添置凳子啊。

其实，这也是公共服务还缺乏“坐下来”的视角，没有完全从人的需求去考虑。

印象中，看过几个与“椅子”有关的小新闻，事儿不大，很温暖。

一个是在老家郑州，市民李峰军在郑州市天明路宋寨南街公交站摆了四把椅子，每天天亮了摆出来，晚上再收回去，就是为了让等公交的人歇脚。

一个是在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街道，在一些没有安装电梯的居民楼楼道转角处，安装“转角椅”，其实就是在一面墙的半人高的位置处安上黄色把手，另一面墙装上可以翻折的小座椅，就是为了让老人爬楼时可以歇歇脚。

遗憾的是，这样的细节在公共服务中凤毛麟角，像郑州的例子还是市民的个体善行。

当然，并不是说公共服务必须政府出钱，整合社会的力量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

在世界各国的大城市中，伦敦的“绿肺”最大，仅皇家公园就有八处，其中包括世界著名的海德公园、摄政公园、肯辛顿花园、圣詹姆斯公园等，总面积达5000英亩。

亮点有二，其一是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，其二就是百步之内，总有长椅可供休息。而且，这些长椅往往并不由公园管理部门出钱，而是来自私人捐赠。

长椅的正上方中央一般都镶着一块精致的金属牌子，写明捐赠缘由——为了纪念逝去的亲人某某某，为了纪念多年陪伴身侧的宠物，甚至，只为了纪念曾经在这里度过的一段快乐时光。

据报道，随意登录几个伦敦的市镇议会网站，很容易就找到今年捐赠长椅的有关通告，每每详细述及被纪念者的生平。

威斯敏斯特区的市镇议会网站还就捐赠长椅的管理和费用作了说明，规定捐赠长椅由市镇议会统一订购和确定安放位置。长椅连同金属铭牌的费用在500英镑左右，全部加工和安装费用则为120英镑。

威斯敏斯特区还规定，从捐赠长椅之日起的10年之内，如果长椅或椅上纪念铭牌被损坏或被盗，由市镇议会负责维修或重新制作。10年之后，如果长椅受到严重损坏以致无法修理，则将纪念铭牌安在同一公园的其他长椅上；如果长椅被盗，则重新制作纪念铭牌安在同一公园的其他长椅上。

这就是作为观念的“坐下来”。

作为态度的“坐下来”

如果说1949年中国实现了“站立”起来的话，那么之后则开始了从“快走”到“急跑”的一连贯动作，终于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摔了一大跤。

1979年之后的中国，开始“稳中快走”的节奏。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增长，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

这种高速之下，不管是城市，还是个人，都仿佛进入了快车道。

快速，不管是给社会，还是给民众，都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变。

“快”，绝对可以算是能够解读这个时代的一个标签。

2011年7月23日的动车事故，为这种“快”，敲响了一记警钟。

动车事故后，曾有人翻出了2010年12月14日的《人民日报》，在头版一篇《“提速先锋”李东晓》的文章中，如是写道：

多一天调试，就能多给旅客一份安全与舒适。上级下了“死命令”：培训时间10天。10天后，必须把第一列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开回北京！

“回北京可以。就安全角度而言，只能让别的机车把这车给拉回去。”迈克斯是个倔老头儿，秉承了德国人一贯严谨的态度与工作作风。

“那我们就打赌吧！10天后我们肯定能开走！”李东晓比迈克斯更倔。

当时，我的朋友、知名评论员童大焕写的几句话被广为传播：“中国啊，请你慢些走，停下飞奔的脚步，等一等你的人民，等一等你的灵魂，等一等你的道德，等一等你的良知！不要让列车脱轨，不要让桥梁坍塌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，不要让房屋成危楼。慢点走，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，每一个人都不被时代抛下，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！”

这只是“快的代价”的一个例子。不管是令人窒息的雾霾，还是拥堵不堪的交通，不管是无法安静的餐桌安全，还是屡屡曝光的资源危机，“快的代价”无处不在，甚至不时有网友戏言“国在山河破”。

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，都需要适时坐下来，想一想。

“快起来”难，“慢下来”更难，而能“坐下来”尤其难。因为，“快起来”需要力气，“慢下来”需要勇气，“坐下来”则需要底气。

目 录

CONTENTS

改革动力

- 改革为什么会缺乏共识** … 002
迟福林 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（海南）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
袁绪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
郑永年 著名学者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
- 触动利益为何难于触动灵魂** … 011
周瑞金 知名政论家，《人民日报》原副总编辑
- “体制内”靠什么诱惑了中国年轻人** … 016
李 强 著名社会学家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、教授
- 让市场经济走向公平与可持续** … 022
高尚全 著名经济学家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
- 小康社会旨在增加民众幸福感** … 029
程国栋 中国科学院院士
- 还有哪些改革红利需要释放** … 035
迟福林 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（海南）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
- 改革红利如何进一步释放** … 041
华 生 著名经济学家，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
- 经济升级：如何不被高增长打败** … 049
姚 洋 著名经济学家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、
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
- 国企是干什么用的** … 056
贺绍奇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
- “克强指数”折射了什么** … 061
卢 锋 著名经济学家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、
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

治理变局

- 社会管理就是管理好社会问题** … 070
于建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
- “不少省份对财政透明改革仍在观望”** … 075
蒋 洪 全国政协委员，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
- 事业单位改革关键看政府** … 081
任剑涛 著名政治学者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
- 不管捐给谁，都要尊重捐赠者** … 087
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，原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
- 免费之后要学会管理** … 093
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，
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
- 十问公车 摸摸良心，都会同意车改的** … 097
叶 青 第十届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，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
- 有效监管是最需要的公共品** … 106
薛 澜 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
- 美国是如何治理矿难的** … 111
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、
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
- 反思毒胶囊：制度无恙 执法有病** … 117
顾 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与管理咨询专家
- 影响官员形象的风险地图** … 121
唐 钧 《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（2012）》主编，
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

城市乡愁

- 控制人口择“高”弃“低”会加剧城市病 … 130
贡 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，“主体功能区人口管理政策研究”课题组组长
- 期盼故乡向高处跋涉 … 136
熊培云 著名学者，南开大学副教授，著有《重新发现社会》等
- 城市认同感：要让市民感到城市可居 … 142
夏铸九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
- 城市并没有让生活更美好 … 146
阮仪三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
- 先有“雷人城市”，后有“雷人口号” … 151
王志纲 著名战略策划学者、王志纲战略工作室创始人
- 新城镇化首先是人，核心是市民化 … 157
辜胜阻 全国人大常委、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民建中央副主席
- 户籍是如何拉大收入差距的 … 163
李 实 社会学家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、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
-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如何测算 … 167
金三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，《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》课题报告执笔人
许召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，《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》课题报告执笔人
- 户籍改革，亟须修改《户口登记条例》 … 174
姚 兵 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员
- “纽约、伦敦、东京、香港”四城地铁启示北京 … 177
徐康明 美国3E交通系统城市交通咨询专家，北京“长城友谊奖”获得者

人文变奏

- 经过了30年，我们与世界思潮同步 …… 184
陈平原 著名学者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
- 文化安全不能靠“闭关锁国” …… 193
魏鹏举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执行院长、
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
- 《朱镕基讲话实录》：任由历史评说 …… 198
黄书元 人民出版社社长
- 演艺区如何繁盛 …… 204
傅维伯 国家话剧院制作人，国话先锋剧场经理
- 国外博物馆如何化解“人海” …… 209
徐湖平 原南京博物院院长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
- 今天还需要鲁迅 …… 214
钱理群 著名学者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
- 我为什么写《坐在路边鼓掌的人》 …… 219
刘继荣 作家
- 中文百年，我们拿什么来纪念？ …… 229
陈平原 著名学者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
- “语文”六十年：从“工具”到“知识” …… 239
徐林祥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，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委
- 历史教育，要让和平写满大地 …… 243
王栋生（吴非）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
邵建 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
李良玉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规则内外

- 好社会需要“管理好人心” …… 252
李 强 著名社会学家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、教授
- 获刑官员减刑假释多？ …… 260
王公义 中国公证协会副会长，司法部研究室原主任、司法研究所原所长
- 冤假错案该如何平反 …… 264
刘仁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刑法研究室主任
- 国外大多没有“嫖宿幼女罪” …… 269
孔维钊 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
- 媒体表达的“安全感”必须得到保障 …… 275
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，
“中国媒体侵权责任案件法律适用指引”课题组负责人
- 三问南海争端 …… 284
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
刘楠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研究员
李 杰 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
- 生存质量比70亿更值得关注 …… 289
葛剑雄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，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
- 从取消准生证开始 …… 294
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
- 后记 …… 298

改革力

社会理

坐下来的
中国

ZUOXIALAI DE
ZHONGGUO

规则外

城市愁

人文
变奏

改革为什么会缺乏共识

访谈嘉宾



迟福林

全国政协委员,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



袁绪程

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



郑永年

著名学者,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

访谈导读

今天,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。未来30年,中国将往何处去?在又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,该如何打好改革这场攻坚战?什么力量能更积极稳健地推动改革?

● 访谈时间:2012年3月10日

改革困境 改革难题是利益关系失衡

● 高明勇：改革初期，“人人皆受益”的“帕累托改进”环境令人振奋，改革的阻力因此较小。如今，当改革进入深水区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已很难再出现“无损被改革者利益”的现象。要进一步推进改革，就必须调整现有利益格局。这也符合大多数人对当下改革困境的判断。那么，是什么导致了改革的困境，又该如何走出困境？

利益关系失衡导致困境

● 迟福林：总体来说，改革的确陷入了困境，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既得利益关系的失衡，这成了影响改革冲出困境的主要因素。应该说，既得利益格局——既包括既得利益集团、既得利益者，也包括某些既得利益现象——已经形成。

在这种格局下，形成了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：第一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，企业、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日趋上升；第二，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失衡，这既与目前的增长方式有关，也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有关；第三，权力运行与权力约束失衡，部门利益、地区利益、行业利益都很突出。

因此，即使有些领域的改革方案确定了，但很难推行，久推不决，决而不做，做而不力。

权力介入要素配置过多

● 袁绪程：改革开放30多年来，中国凭着独有的增长模式及其相应的体制，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跨入已初步实现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。这种独有的增长模式，特指中国独有的、尚未成型的经济形态。对于这种模式，我们不作为稳定范式来理解，也不牵涉模式之争。

这种增长方式，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常态。这里面的原因很多，也很复杂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体制，简单地说，就是政府权力较多地介入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。

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初期，这种体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，带来的成功也是有目共睹的。但是，副作用也很明显。比如，“三高一低”的出现，

即高收入、高消耗、高污染、低产出，这是难以持续的。并且，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和国民需求的提高，其弊端日益凸显，沉淀为下一步发展的障碍和潜在的危机。

转变增长模式的出路在于体制改革。如果不改革现行体制，贫富悬殊问题、分配不公问题、土地问题、环境问题、腐败问题、社会冲突等等，不仅很难得到有效解决，还可能会演化为社会危机。

以被称作“共和国长子”的国企为例，存在三个突出问题：一是“租费利”不清，如该缴纳的资源租金和上缴的利润以及被“摊派”的社会费用不规范，缺少一个明白账；二是企业分类不明，营利性国企和公益性国企未进行明确区分，两者由于职能不一样，不能一刀切地进行管理；三是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理顺。这三个问题解决不了，国企改革必然会陷入困境，并将制约企业自身的长期发展。

决策者改革意志需强化

● 郑永年：现在一谈到改革，大家都会提到既得利益格局，这是一个社会现实，不可回避。

但是，我们要对此进行深入分析。没有一个国家和社会没有既得利益集团，既得利益集团是正常现象。问题在于，既然都有既得利益集团，为什么在有的社会改革仍能进行下去，而在有的社会就很难推进呢？

30多年前，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时，也不能说没有既得利益集团，为什么他能推动？别忘了，今天的改革环境可比以前好多了。

分析30多年来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，有三点重要启示，即成功的改革，需要三个因素：第一，决策者的改革意志要很坚定；第二，改革的目标要很明确；第三，动员改革的一切力量。即使是既得利益集团内部，也有很多改革的力量。

所以，仅仅考虑把既得利益集团打倒，改革还是很难走出困境的，旧的既得利益集团打倒了，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又会站起来，那样还会陷入困境。改革的困境不单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，而且在于既得利益集团是如何影响到改革决策的，要警惕出现利益一体化的倾向。